



【短史记】

没有范仲淹就没有岳阳楼

□许志杰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也是经年历月不同时代人文风骚的刻记与变迁。

岳阳楼名气之大,大在范仲淹一篇旷世巨作《岳阳楼记》。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滕子京谪守巴陵郡重修岳阳楼,就不会有范仲淹的千古绝唱《岳阳楼记》,亦难现浩浩汤汤、气象万千之大观也。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自古,在好的景物面前文人从不缺席。范仲淹之《岳阳楼记》、王勃之《滕王阁序》、崔颢之《黄鹤楼》,无不寄情于山水景物之间写就的百世佳作。滕子京对此认识既超世又越物,他说:“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揽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岳阳楼建成之际,滕子京便想请范仲淹作文以记之,所谓地因人灵,物以文传。文词之重,与岳阳楼不相上下。

据载,自南北朝起就有文人墨客咏岳唱楼,第一位咏吟岳阳楼的文人是山东人颜延之。颜延之(384—456年),琅琊临沂人(今山东临沂),为晋、宋时代的大诗人,与谢灵运比肩。他游览巴陵(岳阳之旧称)城楼,写下《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的诗,清代的《巴陵县志》记:“巴陵城楼当即岳阳楼,时始于巴陵郡,未有岳阳名也”。虽颜延之的诗被认定为第一首描写岳阳楼前迤逦风物的诗歌,但传播并不广泛,摘录几句:“径途延旧轨,登闢访川陆。水国周地险,河山信重复。却倚云梦林,前瞻京台圃。清氛霏岳阳,层晖薄澜澳。”

颜延之作为第一个有记载的吟咏岳阳楼的文人墨客,也给后人带出了一个问题,岳阳楼之称呼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岳阳楼之名始于范仲淹吗,如若不是,又在何时。就像岳阳楼修建起自何年何月一样自古争论不休,岳阳楼名来自哪朝哪代、谁人笔下,至今难以定论。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出自李白的诗中,也就是说不管岳阳楼始建于什么时间,唐朝李白之前是没有岳阳楼之称谓的,至少在初唐或中唐岳阳楼还被叫做“巴陵城楼”“洞庭驿楼”“洞庭连天楼”“南楼”等。

自晋代至唐,不管叫什么,后来的岳阳楼作为军事战略要地,园圃“闲人禁止入内”,只有颜延之这样的名人在当地刺史的陪同下才能一观其雄壮。唐朝局面改观,会吟诗唱词的人多,洞庭湖为沿长江上下船只必经之地,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张说、李白、孟浩然、杜甫、刘禹锡、白居易、韩愈一千名诗人蜂拥而至,倚马千言,形成岳阳楼第一个诗歌创作的高潮。巴陵城已为岳州治所,岳阳作为地名用于岳州成为当地人的称谓习惯,“巴陵城楼”也在民间约定俗成“岳阳楼”。只是流于民间却不见文字,研究者认为在文字中“自李白、贾至诗赋之后,便正式有‘岳阳楼’之名了。”若非要在李、贾之间分出伯仲,多数人倾向前者。

贾至与李白是好朋友、好诗友,也曾经写下《初至岳阳楼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三首》,诗题就有“岳阳楼”。好事者考李白与贾至行迹,虽二人同是唐乾元二年到了岳阳,根据他们的诗意图分析,李白到达岳阳的时间是春天,他所作《与夏十二登岳阳楼诗》中有:“雁引愁心去,吹人舞袖回”句,由此而断鸿雁北归是春天里发生的事。贾至则是秋天,因为他的诗里有:“江畔枫叶初带霜,渚边菊花亦已黄。”洞庭湖都已经下霜了,岂不是言之凿凿的秋天到了。后人开撕谁是第一,其实意义泛白,再说,鸿雁不仅北归,秋天鸿雁还要南飞的。较真起来,还真难判定李、贾谁先谁后。

这一页其实完全可以翻过去了,后面的风景更精彩。贾至做岳州刺史三年,留下《巴陵诗集》,惜

已散佚。李白曾六次到岳阳,写了诸多岳阳楼诗,杜甫的《登岳阳楼》被后人评为岳阳楼第一好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韩愈也写了《岳阳楼别窦司直》,长达92句,而窦司直窦庠的唱和也有40句,大有千言万语道不尽的乾坤世界,不乏“誓耕十亩田,不取万乘相”这样的名句。

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实属不易,资金缺口便是一大难题,于是他冒险募捐,结果落了个贪官污吏的名声,至今还在发酵,无法洗净。岳阳楼竣工的时候,滕子京思前想后,悲喜交加,含泪写下《临江仙》一词:湖水连天天连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芷动芳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清。

也是才分不浅。悲情过去,滕子京想请人写一篇能记录此次重修岳阳楼的美篇,他想到了“文章、器业为天下之望”的范仲淹,于是书就《求记书》派人送给时在河南邓州出任知府的范仲淹。《求记书》洋洋洒洒八百余字,不便抄录,大意就是介绍了岳阳楼重修之后的地理位置,重修的起因、经过,以及自己的想法,请求为之撰写《岳阳楼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及历代历朝文人墨客写给岳阳楼的诗词文赋,供其参考。范仲淹是谁啊,当代大文豪,看了老友滕子京的《求记书》,略加擦了一眼参考资料,即刻信笔走神思,也就打个盹的功夫,368个字的《岳阳楼记》跃然纸上。字字珠玑,句句名言,炼词锻语,琅琅上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本是一则修楼侧记,硬被范大师写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式的人生修养范文。有个人写了一首读后感:“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暇日登临固宜乐,其如天下有忧何?”

范大师《岳阳楼记》誉满天下,留下的问号也是一大串。请问您老人家到底灵感何处来袭,写下如此千古名作,此其一。其二,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就像站在岳阳楼上,可是,您到底来没来过岳阳楼。再者您真的是受密友滕子京之托为他言过其实,掩盖罪过,粉饰太平吗?这也可称之为跨越千余年之间,只可惜范公已去不复还,空余长问叹惊天。这事只能到此打住,有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在,一切皆可抛。

范仲淹《岳阳楼记》既出,各种“岳阳楼记”纷纷出笼,几乎每修一次就有一篇甚至多篇“楼记”。滕子京自己也写了一个《岳阳楼诗集序》,郑民瞻有《重建岳阳楼记》,李曾伯也有同题“楼记”,不计其数。距今最近的一篇“楼记”是当代大书法家于右任在1934年撰书的《重修岳阳楼记》,其中有“夫胜景之于人无私也,贤者因而彰之,以蕲与人同其乐,推之饥溺犹已,固不仅于楼之兴废,致其汲汲也”,算是可以传世的惊艳金句。毛泽东曾手书杜甫的《登岳阳楼》,他为什么没有书写范仲淹《岳阳楼记》,可能与他的个人偏好有关。也有传说,岳阳楼上的“八百里洞庭今入眼,五千年历史再从头”对联是毛泽东所作,也有人说是革命烈士夏曦所作,没有署名,不好决断,从气势看有点像毛泽东之风格。

找了很久,一直没有发现关于岳阳楼诗文词赋、书画作品的确切数字,可能与岳阳楼多次被毁重修有关。但无论多少,岳阳楼是文人墨客以诗词歌赋堆积起来的,似乎并不过分。岳阳楼一次次被毁,又一次次重修,每一次重修都是岳阳楼的一次凤凰涅槃,惟有迁客骚人留下的那些诗文词赋绵延不绝,慧命传薪。至于“登斯楼也”还是“没登斯楼也”已经无关紧要了。

【人物志】

傅高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

当地时间12月20日晚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去世,享年90岁。

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悼念傅高义,并对傅高义教授的逝世表示悲伤。崔天凯大使称,傅高义是杰出的中国问题学者,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其一生中,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并称赞傅高义对中国的意见不仅对研究领域的人而言,乃至对世界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词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这一官方定义多用于形容外国对华友好的政治人物。将其用于一位学者,尤其是一个美国对华问题的研究者,这是颇为罕见的。

说起来,傅高义从事对中国的研究,与当代中美关系一样,算是一场“不期而遇”。

傅高义1930年出生在美国中西部并不十分发达的俄亥俄州,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威斯理安大学,当时美国对服役后军人读书有优惠贷款政策,于是傅高义从了军。他服役结束后进入哈佛大学进修,直到1958年博士毕业。

其实到此为止,傅高义的研究方向还是美国社会学,跟中国甚至东亚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毕业时,他的教授要求他先去国外做一些研究。“我的一位教授对我说:你如果想要搞好美国社会学研究,就应该到国外去,先了解国外不同的文化;做比较研究,应该去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如果去非洲的话,情况差距太大,而欧洲文化又太接近,最好的选择是去日本。”于是傅高义就去了日本,一年学日语,一年做调查,等1960年回到美国时,他已经成为了研究东亚社会的学者。

这个时候,另一个转机又撞到了他的腰。

整个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研究新中国还是一个冷门中的冷门学科。美国对华研究的先行者费正清就曾抱怨说,当时的美国“基本没有学者能讲流利的汉语,也基本没有美国学者能在研究中运用中文或日文文献”。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傅高义学成回国时,情况发生了巨变,一方面中苏关系破裂,中美苏三国博弈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另一方面,炮轰金门等事件,也让美国人认识到,蒋介石对其许诺的“反攻大陆”基本不可能。所以美国需要研究“红色中国”,寻找与其长期相处的可能性。于是美国急需一批专业学者为其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导,刚从日本回来的傅高义,就这么被“赶鸭子上架”了。

可能也正是因为傅高义这种“半路出家”的身份,让他对中国的研究反而有了更多的冷静和客观。这对中美关系来说,是种幸运。

做个比较,美国对苏联的研究,由于开启较早,很多学者都受过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洗礼”,对苏联的研究结论带有比较鲜明的敌视色彩。

但傅高义等人主导的对华研究不同,1963年,傅高义动身去中国香港,在香港生活的一年间,正式开始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有别于美国对苏研究的“命题作文”,傅高义的对华研究从一开始就更加中立客观。他在后来的叙述中称:“当时很多美国报刊希望报道中国‘大跃进’失败的消息……但我们的研究目的着眼于中国1949年后的全面历史发展。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历史悠久,我们预测到中国与美国、世界的关系将逐步展开。我们的学者不想抵制中国的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与中国交流……”

傅高义这种中立的立场,也为中美关系的破冰打下了基础。1969年,共和党人尼克松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费正清与傅高义等十

几位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给尼克松写信,“现在是跟中国接触的好机会”。不仅如此,傅高义与费正清等8位学者还曾去华盛顿,找到时任国务卿,也曾是哈佛大学教授的基辛格谈话,就中国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事实上,由于当时中国对西方的相对封闭,费正清、傅高义等“中国通”自己也并不清楚此时的中国究竟是怎样的。但面对基辛格“中国是否可以接触”的问题,他们依然基于中立客观的立场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傅高义后来坦诚:“其实我们也不太了解中国内部的情况,所以我们都只能说‘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看周恩来的意思可能会做什么事”,但中国真正的事情我们也不太了解。”

但这些回答最终让他们有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机会——在这些研究者的建议下,美国的对华政策从全面遏制转向有限接触,后来又变为全面接触。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傅高义曾经数十次访问中国,多次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在中美密切交往的大背景下,充实、完善他的对华理解。

由于其对华研究起于上世纪60年代,又完善于中美关系较为良好的时代,傅高义的对华观点,在美国的相关研究群体中,是较为亲善的。

2011年9月,《邓小平时代》英文版出版,该书出版后,被誉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必备著作”。2013年1月18日,邓小平南方谈话21周年纪念日当天,《邓小平时代》中文简体版在北京、深圳、成都三地联合首发。作为一本美国学者论述其对华观点的书籍,这本书在华的翻译、出版速度,都创下了当时的纪录。

然而,在这位“中国先生”的对华研究登上顶峰之后,他所遭遇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大约自2013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开始,费正清、傅高义所倾尽心血建立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美国对华研究中的泰斗地位,开始遭受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一些对华态度不那么友好的研究者开始对傅高义的中国论进行质疑。

比较之下我们会发现,傅高义的学术背景是较为纯净的社会学研究,他论述美国对华关系的立足点始终是“中国是可以接触的”“中美关系是有望实现互惠互利的”。但与之相比,傅高义的挑战者们,其学术背景更多来自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甚至有美国政府、军方的背景,其思考的出发点更多是“中美接触是否对美国一方更为有利”“中国的力量成长是否会对美国产生威胁”这种思考出发点的不同,导致了双方注定会在对华观点上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当然,晚年的傅高义,依然在尽力对美国政府施加他的影响力,说服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2019年7月,《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题为《与中国为敌适得其反》的公开信。该信由史文、傅高义等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美国学者和政策制定人士撰写,并获得百名学者联署签名。傅高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美国政府里有一批人,对中国没有好感,不愿意和中国合作。但是写这封信的人都认为,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仍旧要谈合作,“必须要想办法合作,不应该把中国当作敌人”。

今年10月,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傅高义用流利的中文连说了几个“没想到”,“中国发展这么快,我没有想到,恐怕没一个外国人能想得到。”在傅高义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决策“了不起”,是它将中国推上了飞速发展之路。

很显然,无论中国的发展,还是中美关系的今日,都已经超出了这位老人最初的估计——其实,他的人生和他所主导的美国对华研究,又何尝不是一条“未曾设想的道路”呢?上世纪60年代,傅高义和整个美国曾经在国际局势的风云诡谲中匆匆走上这条道路;如今,随着这位老人的离世,中美关系的新篇章,正在开启。



Ezra Vogel